

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

谢立忱

内容提要 国家行为由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土耳其持有突厥、伊斯兰、西方和“外来者”等多重身份认同并推崇西方价值观，这些身份认同和观念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均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方文明成员和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的核心身份，整体上决定着土耳其以西方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尽管这些身份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偏好和对外政策导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关键词 对外政策 土耳其 突厥认同 伊斯兰认同 西方认同

作者简介 谢立忱，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临汾 041004）。

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则由行为体认同的身份和观念建构，尽管有时行为体可能会根据利益选择身份，但是这些利益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先决条件的。^① 国家认同是国家利益的基础。^② 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③ 自我被“归入”他者。^④ 国家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往往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种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东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研究”（批准号为：10CSS010）的系列成果之一。

① 参见夏建平著《认同与国际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2页。

② See Yucel Bozdagli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2.

③ 参见〔美国〕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④ 参见同上书。

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①当身份冲突出现的时候,核心身份的需求往往战胜次要身份的需要。^②另外,国家利益也是由行为体认同的观念和规范建构的。从认同的角度讲,土耳其持有突厥、伊斯兰、西方和“外来者”等多重身份认同,这些身份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均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方文明成员和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的核心身份,决定着土耳其整体的外交取向。此外,土耳其也非常认同西方的价值观,这种观念认同同样影响着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导向。

时隐时现的突厥认同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泛突厥主义首先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沙俄统治下的突厥语系民族中。在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泛突厥主义一度被推向高潮,成为帝国的最高意识形态。泛突厥主义的主要政治目标是,从亚得里亚海滨到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突厥语系各民族联合组建一个统一的大突厥国家。伴随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泛突厥主义迅速萎缩,转而被凯末尔主义取代。然而,这种取代并非彻底,作为现代土耳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泛突厥主义不时沉渣泛起,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时隐时现,使得土耳其的外交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突厥认同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土耳其对所谓“外部土耳其人”的关注。长期以来,在对待“外部土耳其人”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实行双重标准,既奉行实用主义原则,总体上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公开反对泛突厥主义,又必须考虑国内民众对“外部土耳其人”问题的反应,从而给土耳其对外政策打上泛突厥主义或突厥认同的烙印,并染上情绪化色彩。^③土耳其对待中亚各国独立事件和中国东突民族分裂分子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争端上的态度就充分显示出这种突厥认同的影响。

(一) 填补中亚地区真空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伴随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的相继独立,泛突厥主义在

① 参见夏建平著:前引书,第 131 页。

② 参见〔美国〕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前引书,第 225 ~ 226 页。

③ See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1993, p. 249.

土耳其得以上扬。早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前，土耳其国内舆论就普遍认为“外部土耳其人”正面临摆脱“共产主义压迫”的难得机会，纷纷要求政府开展和加强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与合作。^① 苏联解体后，为了填补这一真空地带，建立所谓的“大土耳其斯坦”，土耳其趁机加强对中亚地区突厥共和国的外交活动和泛突厥主义的宣传。泛突厥主义打着种族和语言等旗号，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中亚地区进行扩张和渗透。1991年12月16日，土耳其率先对新独立的所有中亚共和国给予承认。^② 土耳其领导人频繁出访这些中亚国家，并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文化等协议。土耳其政府某些部长和民族行动党特别热衷于在中亚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为了使土耳其在文化上成为突厥语世界的麦加，土耳其通过向中亚共和国提供各种报刊杂志、教科书以及播放土耳其语的广播电视节目等方式，加强文化渗透。^③ 然而，土耳其在该地区的扩张使俄罗斯和伊朗日益感到不安。就俄罗斯来讲，这一地区的突厥语国家本属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加之土耳其出于“突厥情结”积极介入俄罗斯车臣问题（约7%的土耳其人是车臣人的后裔），导致俄土关系恶化。就伊朗来讲，自80年代末以来，伊朗继续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加紧向中亚地区渗透，力图填补苏联东部地区的真空、复兴伊斯兰教，致使土耳其鼓吹的泛突厥主义与伊朗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迎头相撞，这不仅反映了两国对地区霸权的争夺，还体现了双方在认同上的差异，尽管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也掺杂了一定的伊斯兰成分。另外，泛突厥主义设想的大突厥国家也包括伊朗境内相当数量的阿塞拜疆人，也引起伊朗的担忧。

（二）默许中国东突分子的民族分裂活动、插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争端

土耳其对中国东突民族分裂分子的恐怖分裂活动采取默许态度，成为中国土关系发展的瓶颈。同样出于这种突厥认同，土耳其也插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争端。20世纪90年代初，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领土争端加剧，土耳其人要求政府支持同种族的阿塞拜疆人，结果土耳其拦截了经本国运往

① 参见敏敬 《“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第16页。

② See Yucel Bozdaglioglu, op. cit., p. 96.

③ See Eric Rouleau, “The Challenges to Turkey”,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93, p. 112.

亚美尼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却向阿塞拜疆提供财政和物质援助以及关闭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因而加深了土亚关系的敌对。

此外，土耳其长期卷入塞浦路斯希土之争，积极支持土族人实现独立及回归母国的目标，也同这种突厥认同存有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大民族主义，导致主体民族意识过度膨胀和非主体民族应有权利的忽视，致使土耳其国内悬而未决的库尔德问题成为影响土耳其与周边国家乃至美国、欧盟关系发展的一个因素。

90 年代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勃兴与土耳其入盟进程遭受重大挫折导致认同危机密切相关。土耳其自建国后一直对西方有着强烈认同，但 1989 年欧盟（欧共体）拒绝了土耳其要求成为正式成员的申请，面对加入欧盟以确保本国欧洲性努力的屡屡失败，土耳其一时难以释怀，从而引发认同危机。当然，认同危机的发生与此间国内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挑战也有关系。为了摆脱认同危机，土耳其开始为其寻求一个新的身份，泛突厥主义便成为一个合适的选择。土耳其希望通过加强与中亚共和国的关系来提高本国在西方眼中的地缘战略价值，以实现加入欧盟的心愿。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选择并不理想。土耳其自身有限的国力、伊朗的挑战以及对土耳其与中亚共和国之间种族联系的夸大，注定泛突厥主义目标难以实现。当土耳其意识到“大突厥世界”理想遥遥无期，不能成为欧盟的一种替代，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后，更加积极地谋求加入欧盟，以巩固与欧盟及西方的关系。

相互掣肘的伊斯兰认同和西方认同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大体上讲，土耳其官方主要持有西方认同，因而战后执行了一条亲西方外交路线。然而，战后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使得国内民众本来就存有的伊斯兰认同逐渐政治化，导致土耳其对外政策发生调整，并长期受到西方认同和伊斯兰认同的掣肘。不过，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并不足以真正改变土耳其对外政策的西方导向。时至今日，美国和欧盟仍是土耳其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

（一）一厢情愿的西方认同

尽管土耳其绝大部分领土都在亚洲，但它始终坚持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员，一直把靠拢和融入西方，尤其是欧洲当作基本国策。早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时期，就开始了接近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极力清除伊斯兰教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促使国家西方化。以凯末尔为首的新政治精英的基本目标就是构建一种新的西方认同。西化原则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共和国建立初期，土耳其向外派驻的 26 个外交机构中，就有 19 个在欧洲国家。^① 尽管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出于巩固新政权的目的，一度奉行中立外交，但仍积极向西方靠拢。如在 1936 年的蒙特勒海峡问题会议上，土耳其积极与英国合作，支持更加漠视苏联等黑海国家利益的英国方案，结果遭到苏联的严厉指责。事实上，早在苏联威胁出现以前，土耳其便决定加入西方阵营了。^② 因此，这显然不是一个寻求西方保护的简单决定，而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和认同西方的一种必然。^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定位观”已成为土耳其政治文化的主流，西方认同已变成土耳其界定国家利益进而采取亲西方政策的主要因素。融入欧洲及西方是土耳其历届政府长期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冷战时期，土耳其屡扣欧共体大门，积极向美国靠拢；冷战后，土耳其继续致力于加入欧盟，加强与美国的结盟关系。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除欧盟（欧共体）之外的包括北约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国际组织，可见它对西方的极度重视和强烈认同。

建构新的西方认同和清除国家认同中的伊斯兰教因素，意味着土耳其应该疏远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因而除了 50 年代一段时期外，整个冷战时期土耳其一直对中东事务奉行不干涉原则，保持一种低调姿态，尽量置身事外。^④ 长期以来，土耳其都无意增进与这些穆斯林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合作^⑤，反而积极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因为，在土耳其看来，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西方文明国家，与以色列发展关系有助于加强土耳其的西方形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土以关系是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副产品。虽然 60 年代中期

① 参见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341 页。

② Yucel Bozdaglioglu, op. cit., p. 163.

③ Ibid.

④ Ibid., p. 111.

⑤ Mehmet Ali Birand, "Is There a New Role for Turkey in the Middle East?" in Henri J. Barkey, *Reluctant Neighbor: Turkey's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6, p. 171.

之后,由于土耳其与西方在塞浦路斯等问题上发生龃龉,双方关系一度降温,加之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政治势力逐渐崛起,国家认同的双重性(西方认同和伊斯兰认同)开始浮出水面,致使土耳其在阿以问题上愈益实行亲阿政策。但即使在此时期,土阿关系的改善并没有真正损害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也没有导致土以关系的完全破裂,更不是以土耳其断绝与西方的关系为代价。^①此时期的土阿关系仍是十分有限的。如 1969 年在拉巴特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土耳其没有屈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1970 年土耳其没有批准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因为该宪章与土耳其的世俗特性相冲突;土耳其反对激进的伊斯兰立场。此外,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总理强调,土耳其不参加具有政治性质的伊斯兰会议。^②但土耳其仍参加西方的各种国际组织,并继续承担对西方国家的各项义务。而且,此时期土耳其对西方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土耳其更加侧重与欧洲而非美国关系的发展。事实上,土耳其对西方的认同和各种承诺使其无法履行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应负的许多义务。

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当国内伊斯兰政治化的发展已对土耳其的西方认同和西方导向的对外政策构成挑战时,为了增强土耳其在美国眼中的战略价值,增加自己加入欧盟的几率,显示自身的西方性,土耳其一改以往的不干涉原则,在海湾战争中关闭了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石油管道,积极配合美国的打伊倒萨战略。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显示本国对西方的认同,土耳其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谴责,改善和提升与以色列的关系,土以就军事训练、自由贸易和文化交流等问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特别是 1996 年伊斯兰繁荣党上台,进一步突出了土耳其认同的二元性,直接威胁到以世俗化为主要成分和以西方化为导向的凯末尔主义这一立国之本,对土耳其传统的亲西方政策构成最大挑战,从而引起军方的干预。土耳其军方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在国内,军方利用各种经济和政治手段打击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繁荣党,致使信奉伊斯兰政治哲学的内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总理于 1997 年 6 月被迫辞职。对外方面,由于埃尔巴坎不断削弱土以关系,并实行亲伊斯兰政策,军方为阻止土耳其外交政策导向的东转和证明

① Mahmut Bali Aykan,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5, No. 1, 1993, p. 105.

② Yucel Bozdaglioglu, op. cit., p. 122.

土耳其的西方形象，积极发展和提升与以色列的关系。1996年，土以进而结成军事联盟，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响。

当然，土耳其的西方认同有些一厢情愿，因为在西方国家包括欧盟看来，土耳其在文化上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文明属性成为土耳其入盟的一个根本障碍。根据亨廷顿的观点，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其领导人热衷于“搭便车”战略，使国家成为西方一员，但该国在历史、文化和传统上是非西方的。^①而且，土耳其精英虽把本国定位为西方社会，但西方精英拒绝接受土耳其。^②

（二）衰而不亡的伊斯兰认同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创建一个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和构建新的民族认同，凯末尔发起了一场以“世俗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切断土耳其与伊斯兰教过去的联系，革除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影响，清除国家认同中的伊斯兰因素。然而，土耳其是一个有着悠久伊斯兰历史传统且居民中99%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因此，尽管在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的冲击下，伊斯兰教一度被从公众生活中和政治制度层面清除，但在家庭和小型社区中仍存在强大影响，伊斯兰教仍是指导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而为战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弘扬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以及西方化的道路仍使土耳其面临各种严重问题，致使伊斯兰教开始复兴并不断上扬。1970年，伊斯兰的民族秩序党成立，标志伊斯兰主义已渗入政治体制。^③进入80年代，伊斯兰复兴势头加强。1983年成立的繁荣党具有较强的社会基础，其主席埃尔巴坎在70年代曾三任联合政府的副总理，该党对内反对世俗化，对外反对亲西方政策，主张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主导作用。1995年，繁荣党一跃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1996年，繁荣党组建联合政府，埃尔巴坎出任总理。繁荣党政府对内加快了伊斯兰化的步伐，对外加强了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伴随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崛起，尤其是1961年宪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后，各种政治派别和组织纷纷涌现，伊斯兰主义者广泛宣传反西方思想，强调土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 42.

② See *ibid.*

③ Nilufer Gole, "Secularism and Islamism in Turkey: The Making of Elites and Counter - Elit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1, No. 1, Winter 1997, p. 47.

耳其国家认同的伊斯兰性，主张加强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土耳其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为土耳其自 60 年代中期以后，放弃以往在阿以争端上严守中立的政策，转而奉行亲阿政策。例如，土耳其在 1967 和 1973 年的阿以战争中没有允许美国使用北约基地向以色列运送武器；1975 年土耳其与所有阿拉伯国家一同对联合国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决议投了赞成票；1980 年，在以色列决定迁都耶路撒冷后，土耳其政府决定降低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级别^①。尽管土耳其实行亲阿拉伯国家政策有着自身利益的考虑，如 60 年代土耳其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关系的疏远和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但这种利益是与土耳其的认同密切相连的。60 年代后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结束了土耳其在对外政策上的民族一致时期，凸显了国家认同和对外政策中的伊斯兰因素，进而导致土耳其在阿以问题上向阿拉伯国家倾斜。

与此同时，土耳其虽然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伊斯兰认同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各届伊斯兰会议。^② 1969 年，土耳其参加了在拉巴特召开的伊斯兰首脑会议。1970 年，土耳其出席了在吉达举行的第一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进入 80 年代，土耳其除了积极参加伊斯兰会议和继续在阿以问题上坚持亲阿拉伯国家立场外，还大量吸引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外资，密切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贸易往来。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土耳其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西亚伊斯兰国家，并加强与伊朗等国家的经济合作。同时，土耳其通过外交承认、经济援助、政治笼络和文化渗透等方式对中亚新独立国家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攻势。埃尔巴坎指出“土耳其应该与穆斯林国家合作，争当穆斯林世界的领袖，而不是充当欧盟中的仆人”。^③ 他进而谈到“离开伊斯兰世界而成为欧盟的成员，将意味我们失去了认同的本质”。^④ 1996 年繁荣党政府的成立使土耳其成为西亚第一个伊斯兰政党通过选举方式上台的国家，也使土耳其首次出现一位信奉伊斯兰政治哲学的总理，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以及西方认同与伊斯兰认同之间的对立。亲西方势力尽力保持土耳其国家的西方认同，伊斯兰主义者则想改变这种认同取向。这种对立集中表现为土耳其对外政策上的两种不同趋向：当副总理坦苏·奇莱

① Mahmut Bali Aykan, op. cit., p. 101.

② David Barchard, *Turkey and the West*,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 46.

③ Yucel Bozdaglioglu, op. cit., p. 133.

④ Ibid.

尔 (Tansu Ciller) 为证实土耳其的西方属性而频繁出访西方国家时, 埃尔巴坎正与伊朗、利比亚等激进的伊斯兰国家密切接触。土耳其与伊朗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并加强了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埃尔巴坎企图改变土耳其对外政策传统西方导向的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成立“发展中八国集团”^①。在对伊拉克政策上, 埃尔巴坎主张解除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禁运, 并指出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是不公正的, 土耳其有义务支持自己的朋友。^②

然而, 埃尔巴坎忽视了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军队的力量。尽管执政后, 繁荣党对其政策作了必要的调整, 特别是降低了反西方的调子, 但鉴于该党一贯坚持反西方与反世俗化的伊斯兰强硬立场和主张, 尤其是埃尔巴坎企图改变土耳其的“欧洲国家定位观”的一系列外交举措, 严重威胁到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原则, 从而引起军方的干预, 导致繁荣党的下台。可见, 尽管土耳其精英们为构建新的民族认同, 不断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 但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的衰而不亡和政治化雄辩地证明这些精英很难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 也很难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

西方认同使土耳其奉行亲西方政策, 努力实现加入欧盟的夙愿, 并乐于充当阿以冲突的调解者。同时, 国内尤其是民众的伊斯兰情结又使得土耳其继续发展与西亚、中亚等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尴尬的地区“另类”与“外来者”身份认同

无论就中东地区还是欧洲来讲, 土耳其和以色列均有一种“另类”之感。共同的“另类”身份认同使土耳其曾长期重视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 却一定程度导致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疏远。尽管近年来, 土以关系发生恶化乃至出现外交危机, 但主要责任在于以色列一方, 并与土耳其国内民众基于共同的伊斯兰认同而愈益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有关, 而且, 两国并不希望双方关系真正破裂。

① “发展中八国集团”成立于1997年, 又称“伊斯兰发展中八国集团”, 成员国包括埃及、伊朗、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总部设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其宗旨是促进伊斯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推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使伊斯兰国家能够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② See Richard Myddelton, “Turkey Pushes East”, *The Middle East*, October 1996, p. 2.

（一）中东地区的“另类”

尽管土耳其历史上曾长期统治中东地区，与中东多数国家又存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但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在种族、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使其始终有“另类”之感。在土耳其看来，自己是本地区一个实行世俗化和追求民主化的“另类”，而由阿拉伯国家支配的中东是盛行伊斯兰政体和威权政治的地区。这种“另类”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导致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疏远，却造成其与非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关系的走近。土耳其认为，以色列是除自己之外中东地区唯一西方文明国家。以色列在政治、宗教、种族等方面与阿拉伯国家的迥异同样使其成为该地区的一个另类。以色列和土耳其均视自己是西方文明的成员，是世俗的民主国家。在他们看来，他们推崇的植根于欧洲文化和历史的国际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并不被阿拉伯人所认同。^①与欧洲地理上的临近和历史上的联系形塑了土耳其的欧洲认同，而欧洲移民的流入造成的人口构成上的共性也使以色列持有欧洲认同。^②这种欧洲认同时常被他们用于自己与阿拉伯人的比较。其自我认知使两国自感比其他中东国家更为文明，通过与北约、欧盟和美国的联系使自己成为西方文明世界的有效成员^③。此种认知进一步淡化了两国对中东的认同，使得双方感到在这个由不民主的阿拉伯国家支配的地区，他们不被接受，也不受欢迎，从而铸成了两国在心理上的纽带，即共同的“另类”意识。^④共同的“另类”身份认同无形中大大拉近了两国的距离，致使以色列自 1948 年建国以来成为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唯一关系一直很好的国家，尽管不是始终十分密切。虽然面对来自阿拉伯国家要求彻底割断与以色列关系的巨大压力，但土耳其始终保持与以色列的外交联系，且 20 世纪 90 年代两国建立起密切的安全战略合作关系。

当然，土耳其重视与以色列发展外交关系更多是出于重大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例如获得以色列的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利用美国强大的犹太游说力量影响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存在各自利益的考虑，但

① Philip J.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1, p. 82.

② Anat Lewin, "Turkey and Israel: Reciprocal and Mutual Imagery in the Media, 1994 - 199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4, No. 1, Fall 2000, p. 246.

③ See *ibid.*, p. 251.

④ Alan Makovsky, "Israeli - Turkish Relations: A Turkish 'Periphery' Strategy?", in Henri J. Barkey, *op. cit.*, p. 169.

这种利益考虑是与两国各自的认同密切相关的。作为中东地区的“另类”，两国分享着相同的欧洲价值观和认同，均处于地理或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因而两国彼此同情。共同的认同和“另类”认知使土耳其把以色列视为该地区唯一可靠的联盟者，促成了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另外，90年代土耳其提升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同土耳其应对国内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防止本国对外政策伊斯兰化存有关联。而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伊斯兰化则将减弱乃至消除以色列对土耳其的“另类”身份的认同。

（二）欧洲的“外来者”

尽管土耳其、以色列以西方文明国家自居，通过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也得以融入欧洲经济秩序，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仍游离于欧洲之外，未被欧洲所接纳。土耳其和以色列在中东是“另类”，在欧洲则是“外来者”，这使得两国惺惺相惜。保持与以色列的友谊，不仅有利于消除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孤独感，而且可以增强土耳其的西方形象和民族自尊心，加强土耳其在欧洲人心目中的世俗身份，驱除欧洲对土耳其对外政策伊斯兰化的担忧。土耳其认为，它与以色列的友谊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对土耳其作为西方世界的有效成员和民主国家的认同。^① 总之，欧洲“外来者”身份认知导致土耳其为完全融入欧洲，非常重视自己的世俗、民主形象，尽力通过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来证明或强化自己的这种形象。土耳其把以色列视为自己融入西方的一道门。^② 同时，这种欧洲“外来者”身份也致使土耳其无法真正割裂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结 语

国内和国际因素在许多重要方面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形成，进而引起对外政策的变更。就国内层面来讲，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多种组织文化相互竞争的一种结果。当然，这种竞争也具有鲜明的权力较量的意味。建立在不同组织或团体分享权力基础之上的国家，存在多种组织文化，每种组织文化形成各自的认同意识并确定各自的对外政策偏好和民族利益诉求，但国家对外政策

^① Anat Lewin, op. cit., p. 257.

^② See ibid., p. 247.

偏好和民族利益诉求主要取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组织文化。然而，当这种主导的组织文化建构的国家认同不被全体民众所分享时，就会导致其他组织文化的勃兴，乃至造成认同危机。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及对外政策的调整就是一个佐证。就国际层面来说，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可能够进一步巩固国家认同。反之，则会引发认同危机。20 世纪 90 年代初，土耳其国家认同中突厥意识的上扬就与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遭受重大挫折有很大关系。为摆脱入盟挫折引发的认同危机，土耳其尝试寻找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因而全力向中亚等地区渗透，导致 90 年代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多样化。这种认同危机也被国内伊斯兰势力利用，并力图使对外政策偏好与自己的认同意识相符。总之，从认同角度看，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变化是其与西方之间负向互动以及持有不同身份认同的政党或政治精英之间权力较量的一种结果。^① 土耳其对西方、中亚和中东等地区和国家政策主要基于国内不同的认同意识。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Xie Lichen

Abstract: Acts of state depend on national interest which is rooted in national identity.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 has distinctive elements: Turk, Islam, the West outsider, Western values and so on. These identitie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but Turkish core identit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members and European members determines Turkey's Western-oriented foreign policy on the whole, even if national interest preferences and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 will inevitably be affected, when these identities collide.

Key Words: Foreign policy; Turkey; Turk identity; Islam identity; The West identity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① Yucel Bozdaglioglu, op. cit., p. 165.